文献与数据学报
第 6 卷　第 3 期　　2024 年 9 月

道光六年本王凤生《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考略*

熊帝兵　吕　珺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淮北　235000）

摘　要：[**目的 / 意义**] 王凤生《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简称《捕蝗事宜》)长期被众多书目漏录。文章关于该书现状与价值的揭示，有利于引起学界的重视。[**方法 / 过程**] 基于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发现该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所藏的王氏《宋州从政录》中。[**结果 / 结论**] 根据陈仅《捕蝗汇编》引文推测,《捕蝗事宜》被辑入《宋州从政录》之前很可能已经单独刊行。该书以捕蝗技术为核心，涉及人力组织、器械准备、踏勘稽查、及时报告、设厂购买、价格设置、与毗连府县合作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王凤生　《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　《宋州从政录》　徽州　古农书
分类号：G254　G256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4.03.10

0　引　言

清代婺源（今属江西）籍旅外官员王凤生（1777—1835 年）曾撰《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下文简称《捕蝗事宜》）一书。该书目前仅有零星学者在著述中提及过。王毓瑚编著的《中国农学书录》与日本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古农书考》都未予著录。张芳、王思明主编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以下简称《古籍目录》)是迄今为止收录古农书最多的专业性书目，共收存目 2084 种、佚目 284 种，包含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和收藏单位等信息，是农史工作者和目录学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编者在前言中强调，“因掌握各地馆藏农书目录有限，所以还有不少单位的古农书目未被编入，必有一些农书被遗漏未录……这些缺陷有待于今后完善”[1]。事实的确如此,《古籍目录》也漏录了《捕蝗事宜》。学界已开始着手对《古籍目录》作增补与校正工作，代表性的学者有闵宗殿[2]、邱志诚[3]、倪根金[4]、何灿[5]等，他们也都未曾提及《捕蝗事宜》。笔者在整理《宋州从政录》时①，发现了其中辑有《捕蝗事宜》，现对之做简要考述。

* 本文系安徽省 2022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明清徽州农书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AHSKZD2022D0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熊帝兵（ORCID：0009-0003-8257-8251），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文献整理与研究，Email：xiongdibing@163.com；吕珺（ORCID：0009-0007-9757-7816），男，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村社会史，Email：3505539415@qq.com。

1 王凤生著述与《中国农业古籍目录》相关著录

王凤生，字振轩，号竹屿。一生曾任多地多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职务有浙江通判、玉环厅同知、嘉兴知府、河南归德府知府、两淮盐运使等。王氏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地方官员，堪称实干能臣，也是整个清代婺源籍职位较高的旅外官员。王氏与陶澍、汪志伊、林则徐、邓廷桢、梁章钜、程恩泽等大员交好。逝后，魏源拟墓表，梅曾亮撰墓志，林则徐书丹，侧面反映出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王氏尤谙水利与荒政，长于基层社会治理，一生南北驱驰，先后辗转浙江、江苏、河南、湖北等地主持治水、防灾、救灾、赈灾、保甲等事，四方大吏争相奏调，倚其若左右手。魏源在“墓表”中赞之曰：“近日海内谈实用之学必首推君（王凤生）”[6]。王凤生一生著述数量可观，传世近十种，内容涉及水利、荒政、保甲、漕赋、吏治、民风、刑名、鹾政等，体例与题材多样，具代表性的有《越中从政录》五种（含《平湖县保甲事宜》一卷、《荒政备览》二卷、《学治体行录》二卷②、《浙省仓库清查挈要》和《两浙运库清查挈要》）、《浙西水利备考》③四卷、《宋州从政录》若干卷、《河北采风录》四卷、《汉江纪程》四卷、《楚北江汉宣防备览》二卷、《感逝草》一卷等。事实上，王氏著述远不止上述这些，牛继清主编的《安徽文献总目》共计著录王氏著述18种（含析出文献）[7]。此外，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记载王氏《沱（沧）江感旧集》④和《江声帆影阁集》等也罕见于书目著录。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显示，西南大学图书馆藏有王凤生《江声帆影阁诗稿》一卷，附在其父（王友亮）兄（王麟生）诗文集之后，数据库登记的信息为“《双佩斋诗集》八卷《文集》四卷《骈体文》一卷《金陵杂咏》一卷，（清）王友亮撰；《补梅书屋诗草》一卷，（清）王麟生撰；《江声帆影阁诗稿》一卷，（清）王凤生撰。清嘉庆九年（1804）至道光刻本。6册。西南大学图书馆”（以下将王友亮、王麟生著作简称“王友亮父子诗文集”）。笔者就此咨询了学者王鸿平，据他研究前文所述的《江声帆影阁集》其实就是《江声帆影阁诗稿》，系道光十七年（1837）其婿严廷珏搜集整理的刻本。王凤生著述情况见表1。

表1 王凤生著述一览表

序号	书名	析出单行情况	备注
1	《越中从政录》五种	《平湖县保甲事宜》一卷	
		《荒政备览》二卷	
		《学治体行录》二卷	
		《浙省仓库清查挈要》	
		《两浙运库清查挈要》	
2	《浙西水利备考》四卷	《杭州府水道全图》一卷	《七府三江三府图》附
		《嘉兴府水道全图》一卷	《澱泖图》附
		《湖州府属水道全图》一卷	《太湖图》附
		《乌程长兴二邑溇港全图》一卷	
3	《宋州从政录》	《归德府一州七县水道图说》一卷	
4	《河北采风录》四卷	无	
5	《汉江纪程》四卷	《金陵以东至海门江水考》一卷	附《汉江纪程》后
		《江水自武汉东达海门入海图说》一卷	
		《江西全省水道汇入鄱阳湖图说》一卷	
6	《楚北江汉宣防备览》二卷	无	

续表

序号	书名	析出单行情况	备注
7	《江声帆影阁诗稿》	无	附“王友亮父子诗文集”之后
8	《感逝草》一卷	无	即《沱（沧）江感旧集》
9	《江淮河及南北运道全图》一卷	无	《安徽文献总目》1269 页著录，他处未见

王氏著述的特点是不尚浮辞，所论多出于施政经验的总结与实地勘验或调查的结果，以图系说是其著述的最大特色。因此，王氏的图志成就较高，又以水利图志为最。综观王氏主要著述，与农业相关的内容较多，形成了若干成就很高的农业专论。正因如此,《古籍目录》著录了王氏涉农著述若干种，见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著录王凤生涉农著作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版本	馆藏地址
1	0435	《河北采风录》	原刊本	南京图书馆
			道光六年刊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2	0537	《浙西水利备考》	道光年间刻本	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光绪四年浙江书局重刻本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业博物馆、黑龙江省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
3	1848	《札各州县节省徭役檄》	《牧令书》道光二十八年本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牧令书》同治四年重刻本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4	1872	《仓备》	《牧令书》同治四年重刻本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5	1905	《荒政备览》	《牧令书》同治四年重刻本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牧令书辑要》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1958 年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道光三年刊本抄录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6	2581	《浙西水利考》	浙江书局刊本	傅斯年图书馆
7	3010	《河北采风录》	道光六年自序刊本	日本东洋文库
8	3033	《浙西水利备考》	光绪四年浙江书局重刊本	日本东洋文库
9	3520	《河北采风录》	道光六年序刊本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10	3558	《浙西水利备考》	道光四年刊本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光绪四年重刊本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根据《古籍目录》的说明,“目录”分为正编和副编，正编为国内馆藏农业古籍，副编为佚目和海外所藏中国农业古籍。如果将副编中的傅斯年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王凤生著述与正编合并统计,《古籍目录》实际上著录了《河北采风录》《浙西水利备考》《札各州县节省徭役檄》《仓备》《荒政备览》五种。傅斯年图书馆藏《浙西水利考》其实就是《浙西水利备考》。

尽管王氏著述已经受到国内瞿同祖、常建华、冯贤亮及法国魏丕信等知名学者的重视并频繁被征引，但是目前学界对王凤生及其著述的实质性研究并不充分，还处于较浅的人物介绍层面[8]。如吴媛媛[9]的《清中叶徽州王凤生的官宦生涯》以王氏为个案揭示传统社会中一个普通徽籍官员的生活和追求。潘旭辉、王鸿平[10]的《王凤生年谱》成就较高，对王氏家世生平、主要事迹、著述等作了系统梳理。虽然陈淑娇[11]、余婷[12]的硕士论文都是以王氏著述为研究对

象，但是两文对王氏著作文本研究的深度有限。正是因为研究不够充分和深入，还有不少与王氏其人及其著述密切相关的问题没有被揭示出来。《捕蝗事宜》一书就是如此，不仅为《古籍目录》漏录，其他书目也未见著录。

2　《捕蝗事宜》之道光六年本《宋州从政录》

有学者早就注意到王凤生曾撰有《捕蝗事宜》，但是该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徐栋[13]《牧令书》卷二十二《事汇》之最后一篇所收录的就是王凤生《捕蝗事宜》，权且将之称为“《牧令书》本”。事实上，学者彭世奖于 1983 年就曾在文章中提及该书，“清代王凤生在《河南永城县捕蛙事宜》一书中也提出了保护青蛙用以捕蝗的主张”[14]。彭氏在文中只是简单一说，既无引文，亦无注释，且将书名中“蝗”误为“蛙”。后来这个“蛙”字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捕蝗事宜》的进一步研究⑤。彭氏在另一篇文章中将所误之字改了过来，并添加了引文“《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还认为‘鸭子、虾蟆能食蝻子，须劝农民多蓄凫鸭，勿捕虾蟆，亦消弭蝗蝻之一法’”[15]，但其依然没有注明文献来源，很难确认所引内容来自《牧令书》，还是另有所本？彭氏虽然更正了书名的错字，但是更正后的文章却长期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彭氏虽然很早就提到王凤生《捕蝗事宜》的存在，但是一直以来无论是传统古籍目录还是农业古籍书目都未曾著录过该书。最近，吕国强等编著的《河南蝗虫灾害史》中辑录了王氏《捕蝗事宜》全文（未录序文），将全书的内容完整地呈现出来，实在难能可贵。吕氏等简要介绍了《捕蝗事宜》的版本信息及其辑录来源，“原载在徐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撰《牧令书》卷二十二中，为作者王凤生在归德府做知府时领导捕蝗的实践经验。此文对于组织民众、收买蝗蝻、掘沟围打、分别蝗蝻成长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捕除等均做了翔实的介绍，记述了当时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选自《续修四库全书·牧令书辑要卷十事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年版”[16]。显然，吕氏等所辑的《捕蝗事宜》源自《牧令书》。

那么，《牧令书》中所收录的《捕蝗事宜》又来自何处？《河南蝗虫灾害史》中并没有交代。笔者最近在梳理王凤生著述时发现了《捕蝗事宜》的更早版本。因此，吕氏等所说的《捕蝗事宜》原载徐栋《牧令书》并不十分严谨。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藏王凤生《宋州从政录》清道光刻本 2 册中发现其中辑有《捕蝗事宜》。《宋州从政录》系道光五年（1825）王凤生擢河南归德府，治理宋州事务时所作，曾于该年首次刊刻。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的信息显示，道光五年刻本现藏河南大学图书馆（典藏号：353.06/W227）。笔者曾于 2023 年 3 月到访过河南大学图书馆，但该馆图书管理员并未允许笔者查阅原书，只是告知馆中所藏纸本与国家图书馆的在线资源相同，让笔者自行阅读在线资源。笔者查阅了国家图书馆的《宋州从政录》在线资源（索取号：地 711.5/176）。国家图书馆著录并未精确到刊刻年份，所注出版时间为“清［1821—1850］”，但是该书牌记右上刻“道光丙戌”，左下刻“任兰祐题签”，应当是道光六年刻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牌记相同。为了便于区别，暂且将其称为“清道光六年任兰祐题签本”。同年，《宋州从政录》还有其他版本，即清道光六年（1826）河朔官舍刻本，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典藏号：443.689/119）。另外，宁波市

天一阁博物馆也藏有清道光六年刻本《宋州从政录》不分卷，因未能前往查阅，故不能详论。结合在河南大学图书馆的查阅经历,《宋州从政录》清道光五年刻本、道光刻本、道光六年刻本任兰祐题签本、道光六年河朔官舍刻本可能是同一刻本，即道光六年刻本。所谓“道光五年刻本”很可能是录入者根据王氏自序落款而做出的误判。《宋州从政录》的馆藏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宋州从政录》有关馆藏情况

序号	著述	存藏机构	备注
1	《宋州从政录》（清道光刻本）	国家图书馆	实际上就是道光六年刻本
2	《宋州从政录》（清道光刻本）	国家图书馆	残存 1 卷（《图说》）
3	《宋州从政录》（清道光刻本）	国家图书馆	残存 1 卷（《图说》）
4	《宋州从政录》不分卷（清道光六年河朔官舍刻本）	南开大学图书馆	九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已前往查阅。
5	《宋州从政录》不分卷（清道光六年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未曾前往查阅
6	《宋州从政录》一卷（清道光五年刻本）	河南大学图书馆	未允许查阅
7	《宋州从政录》清道光六年任兰祐题签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线查阅

从表 3 可见，各馆著录所藏《宋州从政录》全本的方式和卷数不同，国家图书馆将馆藏全本著录为 2 册，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著录为“不分卷”，河南大学图书馆著录为“一卷”。

《宋州从政录》的卷数著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捕蝗事宜》早期版本的发现。笔者在线阅读了国家图书馆藏《宋州从政录》（索取号：地 711.5/176），标记总册数为 2 册，共 2 卷。但是翻阅该书时发现，封面、卷首等处并没有标明卷次，也无目录、目次等。为了行文方便，暂且以“册”为单位。第一册首载《宋州从政录序》，次录《归德府属水道总图》，图后配说，即《归德府属水道总图说》。所谓“说”，其实是王氏发布的水道勘察公文，如《归德府属水道总图说》实际上收录的是《札各州县查勘河渠沟洫檄》。其后以此为例，依次为商丘县、宁陵县、永城县、鹿邑县、夏邑县、睢州、柘城县七县水道图与水道说，最后是《虞夏永三县水道图》与《虞夏永三县水道图说》。中缝叶次清晰，从“一”至“五十一”。

《宋州从政录》的第二册中缝重新从“一”标注叶次，而且主题也区别于第一册，主要谈的是保甲问题，集中收录了王氏查办保甲事宜的 20 篇公文，首篇为《札各州县查办保甲檄》，末篇为《去归德府留任札各州县檄》，其余分别为查办保甲、弭盗、劝捐义仓、节省徭役的下行公文、告示以及上行复禀等。中缝叶次清晰，从“一”至“五十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册的“五十二”叶之后并没有结束，而是又重新从“一”起到“十”叶，主题和内容与第一册的水道、第二册前半部分的保甲全无关系。其中第“一”叶为王凤生自撰短序，介绍了道光五年（1825）四月永城县的蝻患、捕灭过程以及人员分工等，第“二”叶起首行置标题《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自第“二”叶至第“十”叶，共录 30 条与捕蝗密切相关的内容。

尽管所见国家图书馆藏《宋州从政录》未标卷次，但是从主题、内容以及叶次来看，将其著录为“宋州从政录一卷图说一卷”不够严谨。仅就此书本身而言，“图说一卷”在前，而非在后。结合前文所述的主题和叶码标注等情况，南开大学图书馆著录“宋州从政录不分卷”也不恰当。如果根据三个不同主题和叶次分为三卷更合适。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书目将《宋州从政录》著录为三卷。

黄山书社出版的《官箴书集成》（全10册）以影印的形式收录了自唐代至民国时期有典型意义的官箴书101种，第五册中影印了《宋州从政录》道光六年刻本，并将其标注为“三卷”。其中《札各州县查办保甲檄》所在页的右下角有“丛玉山房珍藏”藏书印[17]，经查，钤有“丛玉山房珍藏”印的《宋州从政录》原书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8]。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官箴书集成》所收录的《宋州从政录》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虽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与国家图书馆藏本的牌记相同，但是装订顺序不同。《官箴书集成》将王氏《捕蝗事宜》不是装订在最后，而是置于“图说”内容之后、“保甲”内容之前，也就是装订在相当于“卷二”的位置[17]。《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编）》第六册[19]也影印收录《宋州从政录》，其所用底本与《官箴书集成》同。正是因为“三卷”的卷数划分和装订顺序，才使得《捕蝗事宜》相对容易被发现。笔者将国家图书馆藏本和《官箴书集成》影印本反复比对，才发现了其中的《捕蝗事宜》之道光六年《宋州从政录》本。

另外，笔者也曾赴南开大学图书馆查阅其馆藏《宋州从政录》清道光六年河朔官舍刻本。其与国家图书馆藏本的牌记存在着明显区别。国家图书馆藏本牌记从右至左依次为“道光丙戌”“宋州从政录”“任兰祐题签”。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牌记从右至左则为“道光丙戌仲春镌”“宋州从政录”“河朔官舍藏版”。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的装订顺序与国家图书馆藏本不同，与《官箴书集成》影印本相同，但其牌记又与《官箴书集成》影印本不同⑥。除此之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还存在一些修补之处。如第一册第14叶中有一行贴了一个修补条，文字为“子方震岳岩国朝之名宦则有宋权其”，经仔细辨认，其原刻文字为“并其子方镇方岳方岩国朝有宋权”[20]。第一册第28叶“批鹿邑县覆禀”中有一字贴补，将原刻“周”字改为“代”字，即将“周家河”改为了“代家河”[20]。

3 《捕蝗事宜》很可能单独刊行过

《捕蝗事宜》是否单独刊行过？目前还不能确定。从几个方面综合来看，该书（卷或篇）曾经单行过的可能性较大。《宋州从政录》结构完整，卷首已经有一篇自序，之后是水利图说、保甲、捕蝗三个不同主题的内容，各自为卷。

《宋州从政录》“序”首先简要回顾宋代以来黄河“南徙北还”的历史及其影响，颂扬清朝的治黄功绩，然后简要介绍归德府的土俗民情，继而详述其莅任之后的捕蝗、勘察水利、兴修沟洫、推行保甲事迹，最后阐述《宋州从政录》的撰写目的与成书经过，“秋九月予复蒙特恩升授河北守道。闻命之下，跼天蹐地。若无所容，行有日矣，而父老多眷眷焉。予怦怦心动，且感且惭。噫！岁之蝗不为灾，旱而得雨，邀福于天也，兴水利、办保甲，中丞所以教也。若夫恤民隐以一省差徭，则良牧令相助为理也。爰录‘宋州从政’一编以相质，愿诸君子无忘其所能也”[21]。从中可见，王氏在阐明写作意图的时候已经完全覆盖了水利图说、保甲、捕蝗三个主题。

按照常理，在已有总序的情况下，卷（篇）之前不需要小序。如果确需小序的话，为了保持体例统一，每卷（篇）之前也都应该添加小序。奇怪的是，《宋州从政录》另外两卷（篇）前并无小序，唯独《捕蝗事宜》前有。现将小序过录如下：

道光五年四月下瀚，(凤生)⑦抵归德任三日，以所隶永城县境有蝻患，亟往捕之。遍野萌

生，间地滋延数十里。余曩所至江浙地方，罕见此物。欲稽案牍以求成法，而迄无存者。茫乎若迷，无可措手。乃周历郊原，察访舆论，以所言试行之。相度情形，继之以思，居两日，章程甫定，而未捕尽之蝻已日渐生翅。其前议捕法又须随时变通矣。经两旬之久，幸得搜罗殆尽，禾稼无伤，而不才殚心竭虑，遇一未尝阅历事，辄觉无所适者。思患预防，以余之临事彷徨为鉴。若夫耳目所未及，固以不知为不知也。是役也，凤生与前署府福太守（祥）董其成，主之者为署永城令高（槐业），分任者为府经历梁（淳）、商邱县丞汪（廷仪）、夏邑县丞刘（廷诰）、试用县丞崔（念祖）、县教谕李（璜）、训导王（瀚臣）、试用未入流程（步云）、吴（端章）例得备书。

道光五年癸未夏五归德郡守婺源王凤生识。[21]

撇开“水利图说”和“保甲”所在的两卷，单独看《捕蝗事宜》卷（篇），前有序言，后有正文，结构体例完整。序言中说，“道光五年四月下瀚，（凤生）抵归德任三日，以所隶永城县境有蝻患，亟往捕之”[21]。此序作于该年五月，从“四月下瀚”到“五月”，基本上算是王氏下车伊始。而《宋州从政录》“序”的时间是该年九月。综合来看，《捕蝗事宜》是王氏到任归德府所撰写的第一部小书，“水利图说”“保甲”等内容则成于其后。很可能王氏在辑《宋州从政录》时，有意将先前已经成书的《捕蝗事宜》辑入其中。

其实，辑书（或篇）入卷的情况在清代并非孤例。同是道光年间，陕西紫阳知县陈仅的《艺蕱集证》也是类似情况。多种史料和目录学著述都记载陈仅曾刊有《艺蕱集证》一书，但是始终找不到该书，借助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也没能检索到满意的结果。后来笔者在陈仅三卷本《济荒必备》之卷三中找到了《艺蕱集证》。该卷卷名即题为《艺蕱集证》。除了《济荒必备》书首存有总序之外，《艺蕱集证》的卷首还保留有道光十八年（1838）陈仅为此书作的“原序”，“原序”之后恰恰是《艺蕱集证》其书[22]。《宋州从政录》将《捕蝗事宜》辑入为卷与上述情况如出一辙。

再者，将此前单独刊行的著述汇编成册，也是王凤生的撰述经验和习惯性做法。王氏任职浙江十九年，曾先后在当地推行保甲、救灾备荒、整顿吏治、清查运库等，后总结施政经验，汇编公文成书。嘉庆二十年（1815）首次刊刻《平湖县保甲事宜》，道光三年（1823）首次刊刻《荒政备览》和《学治体行录》，道光四年（1824）刊刻《浙省仓库清查挈要》与《两浙运库清查挈要》。后来，王氏将上述著述辑为《越中从政录》五种七卷。在此之前，五种原书皆已独立刊行。

事实上，王氏《捕蝗事宜》早在《牧令书》成书之前就已经流传开来。前述陈仅另有《捕蝗汇编》一书传世，其中“论所谓之器”中录了“又飞蝗过多，扑捕不及，应于田间牵一长绳，上系铜铃，一人挽绳摇动声响，可驱之使去。如未落地，则鸣锣放枪，群驱之，自不复为灾”[23]。陈氏自注曰“此一条见王凤生《永城捕蝗事宜》”[23]。陈氏在“宜厚给工实”中的按语为“地方官捕蝗，随从人多。凡差役、轿夫，应各制牛皮巴掌，或旧鞋底一方，给与随带。谕令见即扑打，以钱售收买。既增人力，而于口食帮贴不无小补”[23]。陈氏自注曰“此条参用王凤生《永城捕蝗事宜》”[23]。

陈氏按语中还多处采用“王凤生曰”的形式征引《捕蝗事宜》的内容。在“宜广张告示”中谈及“定蝗价”，按语为“王凤生曰：蝗补将竣，则捕者愈难。欲尽其根株，自当酌增买价。第须查验本地各处蝗蝻实系稀少，卖者已属无多，方可加价。否恐网取邻蝗赚卖，将不胜其应矣”[23]。“宜不分畛域”的按语是“王凤生曰：捕蝗之法，固以收买为最善。倘两邑俱有蝗蝻，邻封并不收买，难免乡民混以邻蝗，赚卖钱文。虽畛域原无可分，而舍己芸人，究应先其急者。

故设厂须各就有蝗之地，就近查察方周”[23]。“相时捕蝗法”的按语是“王凤生曰：捕初生之蝻，必须聚众围打，驱诸沟壑内烧毁。及其生翅能飞，则以围打之夫画段，饬令散捕。若捕剩无多，零星四散，即责成各地户自行扑捉。三者勿紊次序，亦无难于净尽也”[23]。

仔细核对发现，虽然陈仅在《捕蝗汇编》中所录王书内容以及书名的个别文字有差异，但是整体不谬，其内容的确来源于王氏《捕蝗事宜》。陈仅《捕蝗汇编》现存最早版本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刻本。据学者研究，“根据方志和碑刻资料的反映，其成书年代当始于道光十六年（1836）。因为陈仅编此书为指导当年灭蝗之用，但不排除作者日后又对它进行了补充和修订”[24]。尽管《牧令书》中也收有《捕蝗事宜》，但是《牧令书》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晚于《捕蝗汇编》成书时间。因此，陈氏《捕蝗汇编》中所参引的《捕蝗事宜》来自《牧令书》的可能性较小，较大可能性是当时《捕蝗事宜》已经单行，陈仅或见过该书。

4　《捕蝗事宜》的价值

王凤生《捕蝗事宜》篇幅不大，自序约300字，正文约3200字。逐条纪事，每条皆冠以“一”，共计 30 条。如果曾经单行的话，应该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该书内容以捕蝗技术为主，涉及人力组织、器械准备、踏勘稽查、及时报告、设厂购买、价格设置、与毗连府县的合作等诸多方面。章义和在总结清代治蝗书时提出：“从总体上看，清人的治蝗著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抄撮前人的著述，略加评语；二是辑录官府有关治蝗文牍；三是记录当时当地的蝗害，吸收前人治蝗经验，总结当地民众的治蝗方法。不管哪一种类型，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25]。

结合章氏的总结，王凤生《捕蝗事宜》显然属于第三种类型。在王书之前，清代已有不少捕蝗书，如陈芳生的《捕蝗考》、俞森的《捕蝗辑要》、陈世元的《治蝗传习录》等。这些书虽以“捕蝗”“治蝗”命名，但是内容录自他书者多，如陈芳生《捕蝗考》就转录了不少宋代董煟《救荒活民书》和明代徐光启《除蝗疏》的内容，俞森《捕蝗辑要》又有不少辑自《捕蝗考》。王书之后又有陈仅《捕蝗汇编》等。虽然各书也将一些新经验添加进去，但反复摘录前书内容，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捕蝗技术的创新性与地域性。

与上述捕蝗书不同的是，王氏《捕蝗事宜》主要内容完全来自其本人调查所得，而非摘自前人陈说。王氏在序言中说，他下车伊始，永城县就发生蝗灾，“遍野萌生，间地滋延数十里。余曩所至江浙地方，罕见此物。欲稽案牍以求成法，而迄无存者。茫乎若迷，无可措手。乃周历郊原，察访舆论，以所言试行之。相度情形，继之以思，居两日，章程甫定，而未捕尽之蝻已日渐生翅。其前议捕法又须随时变通矣”[21]。从中可见，王凤生来自民间调查的捕蝗法是切实可行的经验。研读《捕蝗事宜》全书，的确没发现其中有引用的内容。方法虽然来自民间，但王氏将民间方法整理成文字，汇编成书，无疑为捕蝗书充实了新内容。王氏将采访得来的捕蝗法，结合蝗虫生长的不同阶段和永城毗连河南、安徽两省的复杂情况，加以变通，尤其可贵。

《捕蝗事宜》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王凤生已注意利用生物间相生相克的关系和食物链原理来灭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生物防治法。《捕蝗事宜》提出：“鸭子、虾蟆能食蝻子，须劝农民多蓄凫鸭，勿捕虾蟆，亦消弭蝗蝻之一法”[21]。据学者研究，养鸭治蝗最早见于陈世元《治蝗传

习录》，其技术或可以追溯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26]。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由鸟类实现的自然防治，无疑为出现于中国的生物防治中最有意义的革新提供了启示，这就是鸭子的应用"[27]。但是《捕蝗事宜》中提出虾蟆（即蛤蟆、青蛙）治蝗，则是相对较早的记载。有学者通过青蛙捕食蝗虫实验发现，"青蛙体型愈大捕食蝗虫数量愈多；蝗虫龄期愈小被食数量愈大。大型青蛙不仅能捕食幼蝻，而且能捕食成虫，小型青蛙仅能取食幼蝻"[28]，结合野外调查结果证明，"青蛙捕食蝗虫的数量相当显著，对消灭蝗害保护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28]。此外，《捕蝗事宜》中的物理防治法也值得注意，"飞蝗最忌油食，因饬各乡以水和油遍洒禾稼之上，可保无虞"[21]。王氏提到利用声音驱赶蝗虫，"飞蝗过多，扑捕不及，应于田间牵一长绳，上系铜铃，一人挽绳摇动，声响可驱之使去。如过境而未落地，则群起鸣锣放枪及放炮竹驱之，庶不致为灾"[21]。王氏还总结了利用蝗虫的趋光性进行捕灭，"飞蝗落地处所，可于日间挖一圆大深坑，内贮麦秸柴草，昏夜举火烧之，俾飞蝗见光自行扑于火内，较省人力"[21]。当然，上述这些方法并非《捕蝗事宜》首次记载或者原创，但是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蝗虫生物学特性的初步掌握。

《捕蝗事宜》除了具有科技价值之外，还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全书虽然是以捕蝗为核心，但是也客观记录了当时官员、地保、百姓面对蝗灾的现实心态。书中记载了一种当地常见的态度，"蝗蝻初生原易于扑灭。无如地保恐令派夫扑打及官役下乡受累，率多匿报，即农民等或因春花未割，或因秋稼在地，一经集夫围捕，必遭损伤，而初生之蝻甚小，所食庄稼无多，得雨仍可长发。延至蝻已生翅，即可高举远飏，害在他方，与本境转无大碍，故亦隐忍不言"[21]。尤其强调了永城县地处河南、安徽两省毗连区的特殊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捕蝗难问题，"本境与隔省邻境毗连地亩俱有蝗蝻，办理最为掣肘。如彼境本系急公协力会补，自无难于扑灭，倘其意在惜费，观望延挨，一俟长翼飞腾，便可报称净尽。此念一萌，势必濒催罔应"[21]。王氏所记载的是永城县的状况，也是当时整个黄淮平原社会状况的普遍反映。

此外，《捕蝗事宜》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该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王氏的捕蝗担当精神。蝗灾属于自然区域性危机，而非行政区划内的灾害，在捕蝗过程中王氏强调要与邻县、邻省积极密切配合，但同时又不互相揭短推诿。他说："如我处捕实净尽，而彼处一任玩延，方可禀明本府移请邻府会勘，亦不必通禀以揭其短，俾全邻谊。若本境并未捕尽，已欲捏饰而思诿过于人，终必水落石出，两无益也"[21]。这样的为官思想与担当意识在当时也颇为可贵。

5 余 论

尽管学界对农书的界定不同，判定农书的标准亦有区别，争论主要涉及一些边缘性著述是否可以归为农书的范畴，但是学界的争论对判定王凤生《捕蝗事宜》是否为农书影响不大，其显然在传统农书的范畴之内，既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书，就应该被《古籍目录》所著录。另外，是否著录与是否独立刊行关系也不大，《古籍目录》给出了著录范围，"有的书内容繁杂，就全书而言，不是农书，但某些卷章著录了农业方面的重要内容，在收录该书时在其书名后标出应收的卷章名"[1]。

《捕蝗事宜》无论是单独刊行，还是单篇流传，亦或者是"析出"农书，都应该被《古籍目录》所著录。《古籍目录》所著录的王凤生《札各州县节省徭役檄》《仓备》出自《牧令书》，也

都是析出文献,《札各州县节省徭役檄》系《宋州从政录》析出,《仓备》系《学治体行录》析出。

事实上，不仅仅是《古籍目录》漏录了《捕蝗事宜》,《皖人书录》《徽州文献综录》等也未予著录。特别是《安徽文献总目》在著录王凤生著作时，不仅仅著录成帙著述，也对单独刊行或者析出卷（篇）作了详细著录，具体见表 4。遗憾的是,《安徽文献总目》将《宋州从政录》之卷一《归德府一州七县水道图说》单独著录，而未将其中的《捕蝗事宜》单独著录，甚是可惜。

表 4　《安徽文献总目》著录王凤生析出卷（篇）情况[7]

序号	析出卷（篇）名	版本	原书说明⑧
1	《归德府一州七县水道图说》	《宋州从政录》道光六年河朔官舍刻本附	《宋州从政录》析出
2	《杭州水道全图》	道光四年江声帆影阁刊本	《浙西水利备考》析出
3	《乌程长兴二邑溇港说》一卷	道光四年江声帆影阁刊本	《浙西水利备考》析出
4	《嘉兴府水道全图》	道光四年江声帆影阁刊本	《浙西水利备考》析出
5	《湖州府属水道总图》一卷	光绪四年浙江书局朱墨套印本	《浙西水利备考》析出

不仅仅是《捕蝗事宜》受到学界重视不够，前述王凤生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不是这些著述自身价值不高，而是落入了学术研究的“夹缝”。近年来，徽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火如荼，关注重点聚焦于文书、谱牒、档案、碑刻等。虽然也有学者在做徽州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但总体上比较薄弱。从地域上看位于今安徽省内的祁门、休宁、黟县、歙县、绩溪等地的个人文集被整理与研究得相对较多，但是原属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的个人文集的整理与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从文献性质上看，除了医学文献之外，徽州地区其他科技文献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徽州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地理单元，文化内容丰富，载体多样，徽州文献整理与研究不应该遗忘科技文献，不应该遗忘婺源的科技文献，更不应该遗忘旅外徽人在异乡所留下的科技文献。

【注释】

①笔者承担的2022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王凤生著述整理”（项目编号：2207）包含关于《宋州从政录》的整理。当前，关于王凤生著述的研究整体上较为薄弱。王氏著述的显著特点是辑篇（卷）为书，一篇即为一卷，但是书首多未设目录，部分著述本身还会出现篇名与卷名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加之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使得王氏著述的基本信息更加复杂难辨。除《宋州从政录》外，《浙西水利备考》《汉江纪程》等著述的卷数、卷名、篇名等存藏情况也都存在类似问题，从表1、表4可见一斑，有待于学者持续关注与不断研究。

②首都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刻本王凤生《学治练行录》2卷。根据卷数、刻本时间以及书目著录等信息推断，此书很可能是《学治体行录》的误著。

③新疆图书馆藏有清光绪四年刻本王凤生《江西水利备考》不分卷，四册。笔者未能亲自赴新疆查阅，但是根据卷数、刻本时间以及书目著录等信息推断，此书很可能是《浙西水利备考》的误著。

④学者王鸿平长期研究王凤生以及婺源本土文献，系《王凤生年谱》的作者之一。笔者2023年12月1日—3日在安徽省祁门县参加安徽省徽学学会2023学术年会暨“徽学与新的文化使命”学术研讨会时恰巧遇到了王鸿平并就此向他咨询。据他研究《沱（沧）江感旧集》就是刻本《感逝草》。

⑤如游修龄编著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引用了彭氏的成果，对此处错字并未修改，依然沿用“蛀”。后来，游修龄与曾雄生合著的《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

页）仍没有发现这一问题。萧洪恩与胡晶晶编著的《天人之镜：长江流域的生态世界》（长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仍延续这一错误。

⑥同一部书在一年之内刊刻两次的情况有点违反常理。笔者就这一问题请教了文献学专家牛继清教授。其根据两种不同牌记和三个藏本的印刷特点做出了综合判断，认为三个藏本使用的实际上是同一刻板，多次印刷。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牌记相同，印刷精良，细微的笔画比较清晰，当为初印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印刷笔画较细，不少地方的笔画着墨较轻，且有多处贴补，当为再印本。之所以在短期内再印且更换牌记，很可能是与任兰祐涉“笆斗案”于清道光五年底被革职有关。王凤生与任兰祐同在浙江为官多年，关系较好，应该是开镌时请任氏题了签。任氏被革职之后，王氏很可能是为了避任兰祐之嫌，才更换了牌记，并在新牌记中特别强调开镌时间为“道光丙戌仲春镌”。通过“河朔官舍刻版”来看，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宋州从政录》再印时用的依然是原来的板片，并非另刻。

⑦原刻本“凤生”为双行小字，笔者将其加上括号以区别于正文大字。下同。

⑧“原书说明”一栏并非牛氏著录的内容，而是笔者将牛氏著录与各刻本仔细核对之后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

［2］闵宗殿.明清农书待访录［J］.中国科技史料，2003（4）：366-376.

［3］邱志诚.当代传统农学目录著作误收宋代农书考辨［J］.农业考古，2022（1）：293-247.

［4］倪根金.《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误收宋代洪刍《老圃集》［J］.古今农业，2003（4）：115.

［5］何灿.《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补正［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11）：121-124.

［6］（清）魏源.魏源全集（13）［M］//湖湘文库（甲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229.

［7］牛继清.安徽文献总目［M］.合肥：黄山书社，2020：1268-1269.

［8］李放.江西历代杰出科技人物传［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04-207.

［9］吴媛媛.清中叶徽州王凤生的官宦生涯［J］.徽州社会科学，2003（5）：53-56.

［10］潘旭辉，王鸿平.王凤生年谱［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

［11］陈淑娇.王凤生之生平著述考［D］.南充：西华师范大学，2016.

［12］余婷.王凤生《越中从政录》的整理与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7.

［13］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七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537.

［14］彭世奖.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优良传统之一——生物防治［J］.中国农业科学，1983（1）：92-96.

［15］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J］//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农史研究（第八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26-131.

［16］吕国强，刘金良.河南蝗虫灾害史［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78-180.

［17］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五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372.

［18］（清）王凤生.宋州从政录［Z］.清道光六年任兰祐题签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9］杨一凡，刘笃才.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编）第六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36.

［20］（清）王凤生.宋州从政录［Z］.清道光六年河朔官舍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21］（清）王凤生.宋州从政录［Z］.清道光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22］熊帝兵.陈仅《艺藷集证》考述——兼论清代甘薯在陕西的引种与推广［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2）：189-199.

［23］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五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501-3509.

［24］倪根金.《捕蝗汇编》撰者陈仅生平、著述考［J］.古今农业，2005（3）：64-71.

［25］章义和.中国蝗灾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247.
［26］闵宗殿.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J］.农业考古，1981（1）：106-107.
［27］（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植物学［M］.袁以苇，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59.
［28］李泗奎，李锡志.青蛙捕蝗实验［J］.昆虫知识，1965（3）：156-157.

Study of *Locust Hunting in Yongche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by Wang Fengsheng in 1826 during Daoguang Reign

Xiong Dibing　Lyu Jun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s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Locust Hunting in Yongche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Abbreviated as *Locust Hunting*）by Wang Fengsheng was often missed in bibliographies. This paper is to cause the scholarly attention on revealing the status and values of this book.［**Method/Process**］Based on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 retrieval and field research to discover this book is currently stored in *Political Record in Songzhou* by Wang Fengsheng, which is hel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ankai University Library and other Libraries.［**Result/Conclusion**］According to the citation of *Compilation of Locust Hunting* by Chen Jin, it is speculated that *Locust Hunting* were likely published separately before being included in *Political Record in Songzhou.* This book focuses on locust hunting techniques and involves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human resource organization, equipment preparation, survey and inspection, timely reporting, establishing factory and purchasing, setting price, and cooperation with adjacent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and also has high value in technolog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Keywords: Wang Fengsheng; *Locust Hunting in Yongche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Political Record in Songzhou;* Huizhou;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s

（本文责编：魏　进）